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古文献丛论

李学勤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7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古文献丛论

李学勤 著

G256.1

L30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文献丛论/李学勤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11418-7

I. ①古…

II. ①李…

III. ①古文献学-中国

IV. ①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8482 号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古文献丛论

李学勤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印 张 17.25 插页 2

字 数 268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898(质管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

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关于《周易》的几个问题	1
帛书《易传》与《易经》的作者	7
孔子与《周易》	11
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	19
帛书《易传》及《系辞》的年代	27
帛书《系辞》析论	33
帛书《易传》《易之义》研究	39
帛书《要》篇及其学术史意义	44
《世俘》篇研究	54
《商誓》篇研究	64
《尝麦》篇研究	68
祭公谋父及其德论	75
有逢伯陵与齐国	80
巴史的几个问题	86
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	90
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	100
申论《老子》的年代	107
试论八角廊简《文子》	114
《老子》与八角廊简《文子》	121
帛书《道原》研究	126
《管子》“乘马”释义	132
《齐语》与《小匡》	137
《管子·心术》等篇的再考察	143
《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	151
《鬼谷子·符言》篇研究	159



《夏小正》新证	165
黄帝与河图洛书	175
《九宫八风》及九宫式盘	183
《易纬·乾凿度》的几点研究	190
《汉书·李寻传》与纬学的兴起	204
严遵《指归》考辨	208
《说文》前叙称经说	217
论魏晋时期古文《尚书》的传流	222
禅宗早期文物的重要发现	231
朱子的《尚书》学	239
《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	247
谈“信古、疑古、释古”	255
汉学漫话	261
后记	266
再版后记	268

关于《周易》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的所谓《周易》热，已经流行了好几年。1990 年春天出版的《中国图书评论》曾为此辟有专栏，提到“沉睡三千余年的《易经》成了当今的热门话题，这为今人始料所不及，然而它毕竟真的‘热’了起来，不仅成了一门‘易学’，而且诸家蜂起，学会团体林立，及于中外”。有关作品数量繁多，缤纷杂陈，令人目不暇接。《周易》在古代被视为六经之首，三玄之一，研究历史文化时自然不可忽略，但《周易》原系卜筮之书，人们谈起来总有一种神秘的感觉。甚至《周易》经传的起源和时代，学者间也有种种不同看法，更使《周易》成为谜团。近年有一些考古发现，给《周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其中 1973 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经传，内容尤为重要。为了准备研究帛书《周易》，我写了一本题为《周易经传溯源》^① 的小书，从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角度对《周易》进行考察。这里把书中涉及的范围，撮要概括为若干问题，供对《周易》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问：《易》是在什么时候起源的？

答：《易·系辞》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讲作为《易》的基础的八卦始见于史前的包（伏）牺氏时期。

目前考古发现的有关《易》卦的材料，最早的是殷周时的筮数。筮数是一连串的数字，有的是三个数字，有的是六个数字，可以按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转译为《易》卦。例如“一一六八八一”，便是下震上巽的《益》卦。这种筮数，在宋代发现的西周青铜

^①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长春出版社，1992。



器上已经出现过，但没有得到认识。20 世纪 50 年代，人们在出土的西周甲骨上也发现了这种筮数。我们曾指出其类似《易》的九六。1978 年，张政烺先生明确地证明它们与《易》卦有关。1984 年，金景芳先生论证它们是进行占筮时所得数字的记录，可称为筮数。

已知筮数实例以殷墟出土的几件实物为最早。筮数有些见于应用器物，如陶器、石器、铸铜用的陶范等；有些见于甲骨，可能是周人在当地使用的，和殷人的很不一样。这些例子都不早于殷墟中期，即殷王武乙、文丁的时代。在陕西等地的商末周初遗存中，筮数的例子大为增多。这说明周人可能比殷人更广泛地运用筮法，并用筮数记录下来。这种筮数已经比较复杂成熟，应该有更早的渊源，有待将来发现。

问：殷周的筮法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答：从文献来看，殷周两代都有筮法，就是用蓍草计数占卜的习俗。先秦古书《世本》讲“巫咸作筮”，巫咸是汤的玄孙大戊时人。按照《世本》一类书的惯例，所谓“作”不一定是创造，也可能是指改进发展。无论如何，殷人有自己的筮法是肯定的。

殷周也都有卜法，即用甲骨烧灼占卜的习俗。周人的卜法和殷人的有不少共通点，然而又有明显的差异，比如甲骨的形制、卜辞的文例等等，都不相同。殷墟出土的有筮数的甲骨很少，都属于周人的类型，所以我刚才说那恐怕不是殷人的筮法。

考古材料已经表明，周人对筮法有较大改进。《系辞》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便可与此印证。《左传》记述，鲁昭公二年（公元前 540 年），晋侯派韩宣子聘鲁，到太史处观书，见到《易象》和《鲁春秋》两书，赞叹道：“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看见《易象》就联想到周之所以王，正是由于文王和《易》有密切的关系。

问：卜法和筮法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答：卜法和筮法本来是两种占卜的方法，但古人常以两者并用，互相参照。不过他们认为，这两种占卜方法并不是平等的，所谓“筮轻龟重”、“筮短龟长”，卜法由于材料难得，手续繁杂，被认为更为重要。人的身份越尊贵，所卜问的事越重大，便更多使用卜法。《礼记·表记》甚至说“天子无筮”。殷墟很少有殷人筮法的遗迹，也许就是由于当地是王都的缘故。

古人还常在用卜法之前，先用筮法，如《周礼·筮人》郑注所



说：“当用卜者，先筮之……于筮之凶，则止不卜。”在占卜大事的时候，更是“先筮而后卜”。有时他们就会把筮法所得到的筮数记在对应的卜法所用甲骨上面。今天我们看到甲骨上面有筮数，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近年发现的战国时期竹简，有一些是占卜的记录，也是先筮后卜，文字的格式也和殷末到西周的差不太多。这证明当时还在沿着先筮后卜的传统习俗。

问：《周易》的经文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答：这个问题，其实在很早以前已由顾颉刚先生解决了。顾先生在1929年撰有《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援引王国维先生等对古史的研究，详细考述了《周易》经文中王亥丧牛于易，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锡马蕃庶等事迹，推定《周易》卦爻辞“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其说精确不磨，为学者所遵信。后来虽有学者以为经文中有更晚的故事，但均未能确证。

经文中这些殷至周初事迹的记载，有些是后人不能追托，甚至难于索解的。例如《旅》卦上九说：“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旅人指殷的先祖王亥。《山海经》说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甲骨文“王亥”的“亥”字常写成从“鸟”。然而王亥的事迹与鸟到底有怎样的联系，后人早已不能知道。又如《归妹》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帝乙时，殷朝势衰，他既不是王亥、上甲那样富有传说色彩的远祖，又不是成汤、太甲、祖乙、武丁、祖甲那样功业彪炳的名王。这个故事没有多大意义，是容易被淡忘的，见于《周易》经文，是其年代较早的一个标志。

问：孔子以前有没有《周易》的学术研究？

答：《周易》本是一种卜筮书，长期流传，只是作为占卜的依据。但在春秋时期，逐渐有些人对卦象进行分析，作出义理的讨论，在《左传》、《国语》两书中还保存有若干例子。比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以《周易》见陈侯，筮遇《观》之《否》，解释说：“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种分析，和后来《易传》是颇相类似的。再如《左传》襄公九年所记穆姜论“元亨利贞”的话，更为《文言》所直接袭用。



刚才提到鲁国太史那里有《易象》一书。过去有人说《易象》就是《周易》卦爻辞，这显然不对，因为晋国也有《周易》流传，如果《易象》就是《周易》经文，韩宣子便不会赞叹了。《易象》应该是论述卦象的书，韩宣子见到它的时候，孔子只有十二岁。

问：孔子和《周易》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这个问题，对于笃信古书记载的人们来说，本来是不成问题的。《论语·述而》篇云：“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可知孔子晚年对《周易》十分爱好，而且自己撰成了《易传》（至少其中一部分）。

《述而》的“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句，汉代的《鲁论》有异文，“易”字作“亦”，这样，似乎孔子和《易》没有什么关系了。实际上，“易”、“亦”音近而讹，从古音来看，只能是两汉之际以后的事。《史记》既然作“易”，作“亦”的异文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马王堆帛书《周易》的传文部分有一篇题为《要》，记载孔子同子贡的问答，也说到“夫子老而好《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这句话的口吻和《孟子》所载孔子所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很类似的。孔子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是因为他对《春秋》作了笔削，所以他与《易》的关系也一定不限于是个读者，而是一定意义上的作者。他所作的，只能是解释经文的《易传》。

问：关于《易传》的形成年代，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吗？

答：有些学者认为《易传》年代很晚，这是由于没有仔细查考各种典籍的缘故。很多先秦到汉初的古书，都曾引用《易传》，有的明引，有的暗引，足供查考。例如《礼记》中子思所作的《坊记》、《中庸》、《表記》、《缙衣》等篇，体裁文气很像《文言》、《系辞》，引《易》的地方也很多。有的语句，可以看出是引《文言》的。又如《礼记》中公孙尼子所作的《乐记》，更直接袭用了《系辞》。子思和公孙尼子都在“七十子之弟子”一辈，他们引用《易传》，可见《易传》不会晚于七十子的时期。

子思、公孙尼子都不传《易》，也不以《易》学著称。再晚一些的荀子，则有善为《易》之名。荀子常以孔子、子弓并称，子弓乃是



传《易》的楚人驺臂子弓，荀子的学术源出于他，因而《荀子》书中多次引用《周易》经传。这也可以看出，《易传》的形成是较早的。

这样说，当然不是认为先秦的《易传》和今天我们看到的完全相同。古书的定形总是有一个较长过程的，但《易传》的主体结构的形成应和《论语》处于差不多的年代，其与孔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问：请介绍一下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内容和意义。

答：帛书《周易》有经有传。经文的释文已在《文物》1984年第3期发表，其卦爻辞和传世本基本相同，只是有许多通假字，但六十四卦的次序全然不同。帛书六十四卦分为八组，每组以上卦相同为准。上卦的次第是乾、艮、坎、震、坤、兑、离、巽，下卦的次第是先取与上卦相同的，然后以乾、坤、艮、兑、坎、离、震、巽为序。这是根据帛书《易传》中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薄”（传世本这段话在《说卦》中，略有差异），也就是一种阴阳说的哲理排列的。这样的卦序，显然要晚于传世本的卦序。

帛书的传文包括《系辞》、《易之义》、《二三子问》（两篇）和《要》、《繆和》、《昭力》各一篇，释文已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六辑中刊布了。帛书的《系辞》，包含传世本《系辞上》的第一至七章、第九至十二章，传世本《系辞下》的第一至三章，第四、七章的一部分和第九章。帛书的《易之义》，包含传世本《系辞下》的一小部分，《说卦》的开头部分，另有传世本《易传》没有的佚文约二千一百字。帛书《易传》的其他各篇，则多与《易》的传流有关。

帛书《周易》自然在校勘上有很高价值，不过帛书有不少错字，有的离奇而容易导致误解，在研究时必须小心对待。更重要的是帛书《易传》那些前所未见的佚文，确是《周易》研究的瑰宝，一旦公布，必将引起讨论的热潮。

问：《周易》之外的《连山》、《归藏》到底是否存在？

答：据《周礼》载，太卜之官掌管“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据此知道《连山》、《归藏》也有八卦、六十四卦，与《周易》相似。看《尚书》、《左传》、《国语》等书，当时确实有“三易”的运用。《礼记·礼运》篇及其郑注认为《归藏》（即《坤乾》）是殷代的阴阳之书，因而也有文献推论《连山》是夏代之书。

《连山》、《归藏》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可是汉人桓谭说两书都存在，还记述《连山》有八万字，《归藏》有四千三百字。晋代的干宝，宋代的罗泌、罗苹、李过等人，曾记录下《归藏》的部分卦名，奇奇怪怪，几乎无人相信。想不到的是，帛书《周易》经文的卦名却有一些与《归藏》卦名相合或类似。例如《咸》卦，帛书作《钦》，《归藏》也作《钦》；《谦》卦，帛书作《兼》，《归藏》也是一样。这样看来，汉以来传流的《归藏》确乎有据，并非全出杜撰。

至于考古材料所见筮数，有没有属于《连山》、《归藏》的，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有待进一步探讨。

（原载《中华文化》，1992（1））



帛书《易传》与《易经》的作者

《周易》的经文为何时何人所作，传统的说法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见于《汉书·艺文志》：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据此，今传《易经》的卦爻辞系周文王所作，故云上下篇。

《汉志》的这种说法本于汉初学者的著作。如陆贾《新语》首篇《道基》已有先圣、中圣、后圣之说。所言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是指宓戏（伏牺）；中圣“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是指文王；后圣“定五经，明六艺”，是指孔子。^① 其中没有明说文王和《易》的关系。

《淮南子·要略》：“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据逐万物之祖也。”所称“周室增以六爻”，与《汉志》文王“重《易》六爻”相应，但未讲明文王，许慎注则说：“周室，谓文王也。”

明指文王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对照《周本纪》所载：“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可知同《汉志》“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云云一致。

^① 参见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06～107页。



由此足见,《汉志》的论点即由这些旧说综合而成,可谓言而有据,其传流久远不是没有缘故的。

《汉志》之说的缺陷,是《易经》有些语句显然要晚于文王。这个问题早为学者察觉,孔颖达《周易正义》即有详细讨论,云:“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又《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细看《淮南子·要略》,只说“周室”,不实指文王,可能也有类似的考虑。

《新语》等书的叙述,也是有所本的,大家知道,就是《易传》中的《系辞下》。篇内除“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一章外,还有这样两段: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

从章文本身,不难得出几点推论:

第一,《易》之兴,是在“中古”,而“中古”即“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就是殷周之际。

第二,《易》之兴,即作《易》之时。

第三,作《易》“当文王与纣之事”,“周之盛德”是指文王之德。

第四,作《易》者“有忧患”,故“其辞危”,这有关“文王与纣之事”。

再参考《明夷》的《彖传》:“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当文王与纣之事,蒙大难、有忧患者,正是文王,所以文王作《易》,《系辞》已经说明了。

怀疑这一传统说法的,可以清代崔述的《丰镐考信录》为代表。

他在该书卷五中说：

近世说《周易》者皆以彖辞为文王作，爻辞为周公作，朱子《本义》亦然。余按：《传》前章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初未言“中古”为何时而“忧患”为何事也。至此章（按指“《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一章）始言其作于文王时，然未尝言为文王所作也。且曰“其当”，曰“其有”，曰“邪”，曰“乎”，皆为疑词而不敢决。则是作《传》者但就其文推度之，尚不敢决言其时世，况能决知其为何人之书乎！^①

崔述的意见，把《系辞》传文割裂开来，是不可取的。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出现，为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依据。

帛书《易传》中与上引《系辞下》有关的部分，见于《易之义》。^② 我个人看法是：“帛书所根据的《系辞》，其构成其实是和今传本基本一致的，不过有一部分脱失，一部分又散入他篇。”^③ 《易之义》里的这些章节，就是这样，同时又有异文，足资探讨。

对应于《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章的，文字大体相同，开首作：

〔《易》之〕兴也，于中故（古）乎？作《易》者，其有患忧与？……

“于中故（右）乎”一句前没有“其”字，由文例看，大约是脱掉了。

《系辞下》“《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一节，由于《易之义》终于该章的前半，应当是佚去了。但篇中有另外一段，与之有相似之处：

子曰：《易》之用也，段（“殷”字之误）之无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功，敬以承事，知（智）以辟（避）患……文王之危，知史记（？）之数书，孰能辩（辨）焉？

按“书”字从“者”声，此处即读为“者”。推测原句可能类似于

① 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2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② 参见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见《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③ 李学勤：《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载《文物》，1994（1）。已收入本书。



“非处文王之危，知史记之数者，孰能辨焉”。以孔子这段话和《系辞下》对比，便知道两者出于同源。所言“恐以守功，敬以承事，智以避患”，乃是文王对《易》之原理的运用，正好同其作《易》“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呼应。

在帛书《易传》的《要》篇中，孔子还有这样的话：

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诤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智）之……之……予何曰（？）事纣乎？

“诤”也有“避”的意思。文王处危避祸，而“《易》始兴”，也说明了作《易》的背景和动机。

《易之义》和《要》篇，编成可能较晚，而所采用的内容应该都是较早的。这里引的各段，和《系辞》一样，都被认为是孔子的言论。因此，文王作《易》之说有着相当早的起源。

《周易》经文的最后形成虽迟于文王，但仍可能在周初，自顾颉刚先生作《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以来，已大体论定。其后尽管有不同见解，未能改变这一观点。^① 古书总有其较长而曲折的演变过程才能定形，看来《周易》经文与文王有关系确实是可能的。

（原收入《国际易学研究》第1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① 参见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14页。